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深处:《同舟共进》精华系列/王家声 应春山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218-05723-1

I. 历... II. ①王... ②应...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449 号

| | |
|------|-----------------------------------|
| 封面题字 | 陈绍基 |
| 责任编辑 | 柏 峰 杨志军 |
| 封面设计 | 张竹媛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 24.25 |
| 插 页 | 1 |
| 字 数 | 384 千 |
|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18-05723-1 |
| 定 价 |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编 委 会

主 任：杨 懂

副主任：邱金用 杜重年 邵 忠

编 委：孙宏光 彭莲萍 郭芙秀 刘亚平

主 编：王家声 应春山

为改革开放立言 为思想解放写真

（代前言）

童 周

2005—2007年，是我们国家、民族历史上有着不寻常意义的年头：改革攻坚、科学发展、新农村建设破题、民主政治步伐加快、十七大胜利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转折关头和重要时刻，应当而且需要留下历史的写照，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政协刊物、言论平台、民意渠道、历史镜鉴，《同舟共进》随改革开放的风雨前行，与思想解放的步伐同进，充当了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小小角色，为广大读者、为人民政协、为政协的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取得了社会和读者的认同，这是杂志社同仁感到欣慰、感到值得为之付出的。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广东的今天，也就没有《同舟共进》的今天。在这个改革风云涌动的时代，在广东这块思想解放的热土，《同舟共进》所关注、所追求的是什么？近年来，它在办刊实践中作了哪些探索，这些，相信是关心、关注我们的读者希望知道的。

《同舟共进》是一份政评刊物（或曰思想文化期刊），它的高端定位决定了它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品位，决定了它的思辨和探索特色。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赢得读者和公众，它必须在思想性与可读性、批判性与建设

性、历史性与现实性、高格调与大众化之间寻找一个最佳（起码是较佳）的结合点。

基于这样的考虑，《同舟共进》作了以下努力和探索——

首先，办刊，尤其办思想文化刊物，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传统的桎梏，讲真话，进诤言。正是因为抓住了“敢言”这面旗帜，“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延续思维”，说了读者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真话、实话，使得《同舟共进》能在国内林林总总的期刊中独树一帜，并为委员和读者的议政、监督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用一位读者的话讲，“虽不能说‘风景这边独好’，但说‘风景这边独特’并无语病。”如果在改革的年代而不能为改革立言、为民众说话，这样的政评刊物到底还有多少群众基础？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常说不要脱离群众。媒体若不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那才是最大的脱离群众。

其次，强化策划、强化“专题”，用“专题策划”支撑整个刊物的思想质量和学术水平，并不断求新、出新，力求做出深度、厚度、力度和角度。2006—2007年，“专题”已经成为《同舟共进》的一大特色。2006年的反腐专题、三农专题、民企专题、鲁迅专题，2007年的社会公平专题、教育专题、香港专题、民主专题、十月革命专题等，在业界和读者中广有口碑，其中的一些文章和观点，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理论探索的宝贵成果。

再次，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作者，包括国内和海外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包括知名度极高的老专家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作者队伍的凝聚和稳定、整合和更新，为刊物的优质稿源提供了有力保障。本刊每期基本保证了半数以上乃至大部分作品出自名家之手，“专题”作者则指定以该领域顶级专家为主体，努力让每期专题都成为精品，每期刊物都有亮点和新东西。

复次，在议事论政、监督建言方面把握好尺度，处理好几对关系，力求有锋芒而不走极端，有锐气而不失理性，有冲击力而不干扰大局，针砭时弊而富含建设性。这是所有政评刊物的难点，但也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政治责任感的刊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试图探索一条思想理论刊物贴近大众、赢得读者的路。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线。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并且花了大力气去做的一件工作

是：怎样让我们办的杂志、刊出的文章，使读者看得懂、看得进、喜欢阅读、乐于流传；我们尽量在去除读者的阅读障碍这一点上下工夫，力求有深度而不艰涩，有吸引力而不媚俗，把最精粹的东西交给读者，并逐步形成简洁、明快、质朴、清新、新颖、独特、敏锐、泼辣的文风。冗言赘语、套话空话、沉闷枯燥、平淡乏味……都是办刊的敌人。我们需要的，是精炼感人、活泼灵动、波澜起伏、新意叠出。语云：“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是灰色的。”难道理论就不能变成绿色，就不能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亲切起来？难道“学术的殿堂、思想的盛宴”就不能走进寻常百姓之中？难道理论就一定是灰蒙蒙、冷冰冰、令人敬而远之的吗？在这方面也需要解放思想，突破固有的思维惯性。编辑部同仁说，如果办了读者和委员看不懂、不爱看的刊物，那就是我们办刊的失败。

以上所述，是本刊这些年学习着、摸索着做的，是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于此处提出，既是向读者汇报，也是一种策励，希望来年做得更好，再上新台阶。

话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本“精华系列”书的编选原则了。《同舟共进》的主体内容，本来就是言论、文史、文化三大板块，如今书分三册，《第三只眼》为言论卷，含有客观的、外在的观察、监督之意；《历史深处》为文史卷，对应了本刊“开掘历史”这一宗旨；《舟边絮语》为杂文随笔卷，借用了本刊栏目名称，表示“舟”中除了严肃的议政、存史资政；还可以说些轻松有趣、引人入胜的文化话题，如此相辅成书，或可给予读者一种别样的感受。

名家很多，精品亦多。限于篇幅、限于体裁、限于组合，很多好文章不得不再割爱；也有的是已收入作者专书专集，就只能酌情选收了。这个选本到底是否“精华”，眼光不同，自可见仁见智，但同仁们花费了时日和心力，则是无疑的，起码可以看作《同舟共进》行进中的一道轨迹吧。

在当今中国期刊界（包括整个政协系统），《同舟共进》无疑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它是政协机关刊物，但不甘于刊登领导讲话、首长剪彩、委员视察；它没有成熟的经营网络和发行网络，没有庞大的采编队伍和派出机构，人员就那么几个；面对某些“牛气十足”的媒体，它显得那么弱势，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它甚至不为人知，然而它却有着不同一般的倔劲与雄心。

不敢说这个团队有多高的水准、多大的能耐，但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念并且不乏激情的群体，此话则不为过。大家的想法其实很朴素，那就是要——“办有思想的刊物”、“办读者爱看的刊物”、“办最好的刊物”，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得快啊。多少个日日夜夜，一晃就过去了。编辑部的同志们——年轻的和不年轻的，不知疲倦地投入，不计代价地付出，竟不知年华已逝。如今，数十期刊物精选而成的三册系列书示与人前，不管如何褒贬，也算是对社会、对读者的一个交代了。

就像不想办“没人看的杂志”一样，《同舟共进》也不想编“没人看的书”、“没意思的书”。相反，它所追求的，是读者“拿起来就不想放下”。至于这套“精华系列”书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个《代前言》有没有“王婆卖瓜”之嫌，那就让时间这个最公正的裁判，让读者和市场这个最严苛的买家去评断吧。

不想写“期盼方家指点，期待读者指正”一类的话。但不能不说的是，假如没有读者、作者、领导一以贯之的关心、支持、指导，没有杂志社同仁的竭诚合作，《同舟共进》的生存、发展，包括这套“精华系列”书的出版面世，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大实话。

广东省政协陈绍基主席为本系列书题写书名，知名学者、本刊编委杨天石先生为本系列书作序，谨此深表谢忱。

2007年12月29日晨

民言无忌（代序）

杨天石

“《同舟共进》精华系列”三部书即将出版，邀我作序。我很喜欢这个刊物，也想写点什么。苦思之下，想起旧时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我想改动一个字，叫“民言无忌”，借此写一篇小文，以代序焉。

忌者，顾忌、禁忌、忌讳之意。“童言无忌”者，一是不去限制儿童说什么，不说什么，二是对儿童的话，什么都可以听，讲错了也不要紧，不用去打儿童的屁股。“民言无忌”者，就是老百姓讲话，不必有什么顾忌，什么都可以说；而“在上位者”则尊重老百姓的权利，维护老百姓讲话、议论的自由，讲错了也不要紧，不去琢磨如何打老百姓的屁股。

何以这样说？

孙中山曾经说过：在共和政体之下，老百姓是皇帝，而各级官吏，“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自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公仆”。也自然，主人有自由说话之权，而“公仆”则唯人民之言是听，照人民意志办事。然而，有一段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民言有忌”、“民言多忌”。“公仆”为主人定调调，划框框，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许讲；更有甚者，“公仆”听到不悦耳的话，反而给主人戴上一顶什么“帽子”，从此列入“另册”。在这种情况下，要老百姓

敢讲话、讲真话自然很难。前些年，学术界讨论“异化”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现象，其结果是，认为有“异化”现象的学者被视为“精神污染”，受到刺激，自此一病不起，最后呜呼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异化”。主人无权讲话（包括学术争鸣），而“公仆”颐指气使，随便加主人以“罪名”——不是“异化”是什么？

民言“有忌”的结果是：主人不能讲话，万马齐喑；“公仆”敢想敢说，信口开河。于是，先有“大跃进”，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三年“灾荒”，千万人成为饿殍；于是，继之以“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果是千万人挨斗被批。为什么？难道亿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看得出这些明摆着的近乎荒唐的错误？非也。中华民族一向不缺聪明智慧之士。但是，“言者有罪”的前车之鉴在那里，老百姓谁敢进言？又到哪里进言？倒是有若干位勇敢者，如辽宁的张志新等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了，然而，等待着的却是在结束你的生命之前不让你有喊叫一声的可能。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确实，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们最聪明，看问题最准确、最深刻。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也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找到解决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完善制度、创新制度。这些年，人们不是常常慨叹贪腐严重，不易根除吗？其实，人民的眼睛最亮，“公仆”之中，谁个真正为人民服务，谁个假为人民服务之名，行自利自肥之实，哪个好，谁个劣，人民群众一清二楚。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选优汰劣，弘扬正气，使赤忱为民者、清廉者、真正有能力为民办事者升迁，使贪腐者、溜须拍马者、平庸无能者无所遁其形。也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上下通气，使“公仆”摸准主人的脉搏，了解主人的愿望与需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从而更好地为主人办事。

过去有一种说法：“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种说法允许人说话，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流露出一种忧虑：让人说话，有可能捅娄子，出事儿——还是看不到让人说话的必要性。其实，让人说话，利莫大焉。至少，

会让“公仆”少犯错误；有了错，也会克服得快一点，不至于一人错则举国皆错。

每人都有一张嘴，一用以吃饭，二用以说话。因此，言论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自有宪法始，中外宪法都将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任何权利都难以实现。我们的宪法明明白白地写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试想，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做到“民言无忌”，人民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社会主义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外，还应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们自由说话的权利。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拜言论自由之赐，创造出号召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言论自由度，而不是相反。

还是总设计师说得好：“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怎样才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避免“鸦雀无声”的“可怕”局面？或是虽有“声音”，却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呈现另一种“可怕”局面？除了实行“民言无忌”，真正贯彻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外，别无他法。

写到这里，有人会担心：有胡说、乱说者，例如恶意诽谤、攻击，怎么办？丝毫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法律管着吗？

1950：黄炎培上书毛泽东

黄方毅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上书”或“万言书”几乎是灾祸的代名词。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被当作文艺界的反革命大毒草；1959年，庐山，彭德怀因一封关于“大跃进”的建言书而招致罢官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初始，吴晗之厄运始于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之倒台则源于《二月提纲》。凡此种种，因言而罪在历史舞台上不计其数，司空见惯。反过来，言而无祸、书而无罪似乎是历史的鲜罕事，当事者似乎也成了历史的“幸运儿”。1950年春，我的父亲黄炎培连续上书毛泽东，洋洋万言直揭时政弊端，意见直率，然而却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并被接纳了。



黄炎培

进入官场，直言之习不改

从青年时期开始办学，且不肯从政做官的黄炎培，抗战时期开始被国、共双方作为社会贤达之一举荐为国民参政员。他于1941年创建民盟，1945年又创立民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几次相邀，黄炎培破除不做官的传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政之后，他认真之风如旧，直言之习不改。到任之初，毛泽东问他感觉如何，他答：“有决心，无信心。”毛送他四个字“调查研究”。黄对此认同，而且认真去做。怎么调查研究呢？一是下去，虽已七十高龄，他仍坚持每年到工厂、农村、街道考察，而且考察之后，时有报告呈交中央。黄视察周庄等地后专门报告毛泽东建议予以保护，得到了毛的批准，从而使这块瑰地如今得以向世人展现江南传统风采。调查研究的另一方法是听取送上来的意见，主要是人民来信。黄对此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前从不用秘书的他，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人民来信，成立了由我母亲姚维钧牵头的秘书班子。来信中凡是他能办理的，他都努力去办；涉及大政方针的，他上报中央；涉及个别部门或地区的，他转交有关部门；涉及写信人的个人问题的，如生活困难、就业无着，他都尝试去办，从不推诿。一直到他去世后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仍有此类来信寄到我家，要求帮助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作为收信人的我母亲自身性命都不得保，而即使黄本人在世，又能如何。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胜利，全国范围的斗争逐渐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7月，中央把陈云从东北调入北京，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为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又提出让黄炎培和薄一波一起担任中财委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便婉拒，并推荐北京大学校长、老友马寅初出任。中央接受了黄的建议，任命马为副主任，之后又增补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黄自己则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同时担任中财委委员。

在中央领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

线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金融战线上，经过银元、粮食及纱布两个回合的较量，抑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1949年底开始，物价趋于稳定，财政逐渐好转，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也逐渐形成。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也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然而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参与其事的薄一波曾回忆当时的形势：“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据薄老回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批发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下降了83%，棉纱下降了近一半；全市1000多家工厂倒闭，2000多家商店停业。上海市长陈毅紧急报告说，“上海人心浮动”。

第一次上书毛泽东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信息，惯于忧国忧民的他难以平静。1950年4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结束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回京不久，即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黄炎培等30多人聚宴。之后数日，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月17日完成三千余言，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四人：

毛主席、恩来总理、陈云、一波同志：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十二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他列举了他收到的三封信，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逼出人命等。“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

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 1000 多人，只松江一区 300 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料的偏差，怕还不只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反映问题后，黄提出纠正的五项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

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眼前的救灾，下届的征粮，如何处理？如何改进？皆须从此行取得确切的材料，做新的决定的根据……

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连同税收人员……

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

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

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急需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

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然而不断收到下边告急信息的黄炎培更加焦急，此后几日他又多次向陈云书函：

陈云同志：恕我尽言，以我所知，上海（当然不只上海，不过我来往人较多，知之较多且切）市况实已近于危急。必须趁早用全力来扭转，越迟越难。如您想定办法，我意不必迟至下星期二……

这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催促。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上来，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差不多，这从30年后薄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

再次上书毛泽东

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炎培信上提及“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等语句，未必很入耳，但善于从大处着眼、“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不太计较这些。黄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炎培，长谈两个半小时，黄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毛、黄两人在毛的书房里促膝相谈，商讨黄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

临别，毛再嘱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回到住处，黄极为兴奋，虽已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的态度鼓舞并为之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黄拿起笔给毛、周、陈、薄写信，写了3天，29日方搁笔，共七千余字，急呈毛泽东等人。信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在第二大部分“我的看法”中，黄炎培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的看法，不论乡村或城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顾不到，说他们是偏差，偏差是从这上边来的。这完成任务，倒不完全是邀功行赏，是有意义的，为的是打台湾，为的是回

笼货币，平衡国库收支，符合了《共同纲领》第四十条规定的上一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可惜没有符合下一句，“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向老百姓有所取，政府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中间有一个铁的原则，征粮也好，征税也好，乃至募公债也好，都不违反这个原则，这一原则是什么？“取之有余”，就是“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多余多取”当然是好的，那么到“少余少取、无余不取”时怎么办呢？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政府要十分小心，多方照顾，要使老百姓走上“多余多取”的路，才是公私两利，千万不能让老百姓走上“少余”乃至“无余”的路上去。如果真做到农家关门了、工厂商店关门了，那政府也只有关门的一法（作者注：最后这一句，在信的原稿上已被划去，不知正式抄件上是否保留）。所以主席提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指示，所以《共同纲领》有“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上一句话，还有“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下一句话，只有“增加生产”、“照顾生产”，才能培养税源，税源得了培养，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因此我想到真理怕是在这上边，就是做事要“适度”——深度、广度、速度。如果说一般农村、一般工商业，本来存在着许多不健全的基本因素，那使我们更想到做事要“适度”了。

黄信的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第一，把各项税种、税则、税率重新审核一下……

第二，在不致走上通货恶性膨胀的道路下，关于贷款、关于订货购货等等酌量开放，采用各地照顾原则……

第三，扩大向国外开门，要缩短减少税收时期，必须加速恢复繁荣农村购买力，一时还不易恢复，唯有排除一切困难，尽力打通国际贸易路……

第四，农村有灾必赈，切实执行主席“不许饿死一人”的告诫……使一般人民确信是自家的政府……我向认为于农民最有利的办法只有抵押放贷，经过若干时间，农民得于涨价之后脱售，这样利归农民了。此法公家当然好办，同时也可鼓励民营金融业来办，但须限制其利率……

第五，宜有一种文告……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样涣散的人心重新团结兴奋起来，应是不难做到的。

如果说黄炎培致毛泽东第一封信建议的5项措施，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第二封信的这五项建议应该说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这是几十年来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成立后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直至新时代到来，才逐一成为现实并超出了黄当年的预想，如对外开放、外商外资、私营经济、农村手工业等；还有的建议如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陈云：“黄炎培是好人”

思想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在社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50年变迁，国家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场场、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化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黄炎培信中所表述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应当说它已经被历史所认可。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黄的看法与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理念与经济主张不甚合拍，这从此后几年里陆续发生的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中得以证实。

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黄炎培满意，也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1950年5月30日日记）。几个月后，黄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1950年11

月 29 日日记)

就黄炎培的信本身来说，也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黄也发现他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是被夸大的，为此他向毛泽东坦陈自己的过失。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建议的内容，而且在于建议的形式。“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与黄之间是做到了。只可惜这种权利，或许仅仅来自政风开明，来自政治需要，来自领袖宽容，来自个人交情（黄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的老师），而难以为继，更难以为久。没有制度保障，权利只能算作礼物，算作恩惠，是靠不住的。此后一些上书人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黄本人发言权的逐渐减弱和晚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即使这样，黄也是幸运的，与之后彭德怀相比，与刘少奇相比，与梁漱溟相比。但真正幸运的，还属为之受益的干部群众。无论黄信上讲的中央指示到达后被释放的人们，或受灾后能吃上饭的人们，还是三年灾害政策调整后的人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百姓们。遗憾的是，毛虽接纳了黄的信，但有的问题并未真正在实践中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严重。彭德怀信与黄炎培信相隔近 10 年，所提的问题竟如此相似，有的如出一辙。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与反思，“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称黄炎培等为共产党的“诤友”，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言要面对历史，人格更要面对历史。值得一书的是，2005 年 5 月，我应老校友薄熙来之约去玉泉山看望当时已届九八高龄的薄一波老人。作为 55 年前这桩往事唯一健在的当事人，薄老听着我的陈述，不住点头，凝视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找寻着当年父亲的身影。之后说话已有困难的他一字一字地吐音：“黄——炎——培——好……”约定的 20 分钟见面时间已过，老人却不让我离去，嘴唇颤抖着，眼中闪现晶莹的泪花。

还值得一书的是，这桩往事的另一当事人陈云，40 多年后的 1991 年，在收到为黄炎培故居题名的请求时，毫不犹豫地对身旁人说：黄炎培是好人，我要为他写。87 岁的他当日即写下题字。或许他提笔之时，还能依稀记起 40 年前的这段往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